本书是多篇与“士”有关的专题研究的合集，余英时在序言中对中国的“士”进行了宏观的阐述，并与西方的知识分子阶层作了比较，作者对于大旨的把握有相当的启发性。而正文部分，由于是分散的专题研究，并无中心的主旨，也未围绕着特定的主题，只是都与“士”的话题相关。虽考据细密，观点精炼，但合在一起便显得松散而无系统，通览正文，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能够对历史上几个具体时期中国士大夫群体的起源演化或精神思想或社会影响有一定的认识，却尚不足以从序言中那般放眼全局的视角来给予读者以系统的、宏观的、整体的理解。从行文中可以窥见作者见识、判断力与历史态度的不凡，可惜未能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提供较为全面的把握。不过这是本书并非“通史”研究之故。

在西方文化中，与中国“士”最相似的概念是知识分子，但西方学界一致认为，近代涵义中的“知识分子”（除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必须在超越个人的私利之上深切关怀着国家、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在近代以前并无明确的传承谱系。也就是说，西方的“知识分子”概念的出现是极其晚近的事。无论是“士”还是知识分子，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大体都可以看作人类社会中掌握着“先进”知识的一个阶层（意味着具有自我意识），在西方的古典时代，他们一般以希腊公民，罗马元老或骑士的身份出现，中古时代，则变成了基督教的教士，这种不同时期身份上的不一致（至少是名称上的不一致）的情形在中国的“士大夫”身上并未见到。另一个类似的差异，西方文明传承的主体在历史的长河中几经改变，从古希腊、古罗马、近代欧洲再到美利坚合众国，光荣不曾在同一政治实体中重现，文明旧的“宿主”也随着旧日的光荣一同湮灭；而承续中华文明的主体则始终没有像西方那样彻底地改变，有着清楚明晰的传承过程。上述的两种差异，大概有着某种对应性，反映了东西文明的重要分野。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许多的时期里，“知识阶层”往往与某一具有明确的经济基础的群体具有较大的重合，如地主或资产阶级，但真正令其成为一特殊群体的特质仍是与“知识”直接相关，因而“知识阶层”具有相当程度上的超越性（并不是绝对性的），而愈是在人类精神的上扬期，这种超越性则愈是显著，“知识阶层”便愈是在思想、行动上与文明整体的利益站在一起。反之，则“知识阶层”的品性便更加向所属的经济关系产生依附性。“知识阶层”的这种超越性也为作者所特别指明。

广义上来看，将“士大夫”视为“知识分子”的特殊一类也不无不可，但意义产生于差异之中，既然“知识分子”的概念产生于西方文化的语境之中，并已与特定的西方价值（不可否认，这些价值有一部分的确符合所谓的“普世价值”）相绑定，那么当下仍应当将“士”与“知识分子”分开来讨论。

东西方知识阶层间的差别，主要源于东西方文化中深层价值取向的差别。这本身又是一个极为宏大的题目，在这里笔者只提及一点，即东方文明较之西方文明更注重整体性（这里说的不是古代文明中普遍出现的整体“科学”倾向，而是哲学上的取向），西方文明更为看重部分性。“士”是中华文明在思想上直接的继承者、实践者，“知识分子”是西方价值的传播者、发扬者。如今，唯有西方文明走出来中古时代，实现了“现代化”，中国在西方式的现代化浪潮前无暇自顾，忙于应付各色的挑战，尚无余裕将古老的文明带入“现代”的模式之中。于是，“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的消亡也成为了必然。有学者认为，对历史的研究不能提供对未来的预测或对人类前进方向的帮助。自认“士”后继者的笔者，仍旧不免怀有一种尚不可直接证实的信念，对于“人类文明”整体而言，中华文明不应也不能只停留在期中古时代，需得有她“现代”的必要，那也将是中国“士”的传统延续之时。